

2025社會韌性論壇

文化韌性與 文化資產的保存 論壇手冊

-跨領域的對話

引言：以韌性開啟文化的新篇章／林福仁（清華大學永續長、韌性研究中心主任） p.2

主題一：文化韌性、建築文化資產與公眾參與

歷史城市中文化遺產的韌性思考與行動／榮芳杰（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副教授） p.4

北埔聚落的文化資產保存價值／姚其中（臺北市古風史蹟協會創會會員） p.6

公眾參與—當我們站在文化資產制度高牆前／林秀叡（藍盾永續文化有限公司負責人） p.8

主題二：文化資產活化與北埔、芎林經驗

姜阿新教育基金會與姜阿新洋樓經營分享／黃雍熙（姜阿新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p.11

歷史建築活化與北埔經驗案例 龍瑛宗文學館成立與運作
／劉抒芳（龍瑛宗文學藝術教育基金會董事） p.13

下山水尾鄭氏家廟的修繕歷程分享—回歸初心的旅程／鄭香辰（私立承山幼兒園執行長） p.15

主題三：文化資產保存共識與所有權人權益

新姜在北埔的發展記憶與紀錄—新姜後代的回憶／姜逸浩（新姜天水堂） p.17

如何對原來古蹟所有權人進行補救措施和保障所有權人的開發權益？
／符宏仁（符宏仁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p.19

政府部門協助民間保存文化資產和「公共財」的可能創新方案與政策
／楊長鎮（客家委員會前主委） p.21

引言：以韌性開啟文化的新篇章

／林福仁（清華大學永續長、韌性研究中心主任）

在此與各位齊聚一堂，共同探討「文化韌性」與「文化資產保存」，對我而言，是一件極具意義的事。韌性並非單純的專業術語，而是一種能夠支撐社會面對挑戰、推動永續發展的核心價值。



「韌」字的本義為「柔而固也」。這意味著在外在衝擊與變動之中，能保持靈活調適的能力，同時維持內在價值的堅定與力量。正是這種「柔中有剛」的精神，使韌性成為當代社會應對不確定性的重要基礎。自 2023 年成立「韌性研究中心」以來，我們便以此概念為核心，嘗試將教育、研究與社會實踐緊密結合，並透過不同層次的探索，開展韌性在文化資產領域的具體意涵。

在大學的角色中，我們逐漸意識到，學術的價值並不僅限於知識的積累與傳授，而在於「接地」。所謂「接地的學術」，意味著學術不再侷限於象牙塔，而必須回應社會現實，回應產業挑戰，並透過與地方社群的合作，實際產生影響。唯有如此，學術成果方能真正轉化為社會的資源，進一步回饋公共福祉。

韌性可以從多個層面加以理解。於個人而言，它是一種心理上的堅韌，幫助人們在壓力與困境中維持平衡，並重新尋找前進的力量。於社會而言，它關乎世代之間的交流與融合，特別是在高齡化的趨勢下，如何建立跨世代的理解與互助，將直接影響社會的和諧與延續。於企業而言，韌性則代表在快速的科技發展與全球化競爭之下，能兼顧環境、社會與文化，維持長遠的可持續發展。最終，這些不同層次的韌性，將共同匯聚為國家的韌性，並成為政策制定與社會治理的重要依據。

然而，韌性必須透過實踐方能具體呈現。因此，我們推動「韌學堂」的設立，作為跨越學術、產業、政策與社會之間的交流平台。在韌學堂中，知識的分享並非目的，而是行動的起點。透過論壇與討論，來自不同領域的參與者能彼此交換觀點，協力回應社會所面臨的挑戰。近年來，我們更嘗試引入人工智慧（AI），發展「知識助手」（Knowledge Assistant, K- Assistant）系統，協助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知識連結。這一嘗試所強調的，並非取代人的思考，而是藉由科技工具，強化集體智慧的網絡，推動更具韌性的合作模式。

這些探索，也在地方實踐中逐漸展現成果。以新竹北埔為例，我們投入多年心力，嘗試從地方出發，思考鄉鎮如何邁向永續發展。地方的韌性，除了基礎建設的提升，更關乎教育、文化、產業與世代共融的整合。去年，我們與在地社群合作，在鄧南光影像紀念館舉辦策展，串聯六個組織，共同講述北埔的「韌性故事」。這些故事展現了地方社會在挑戰中自我調適與創新能力，也提醒我們，文化保存與永續發展並非兩條平行線，而是相互支撐的進程。

文化韌性，本質上是一種跨世代、多利害關係人之間的持續對話。它不僅涉及文化資產的保存，更強調在制度、政策與專業知識的基礎上，透過溝通與協作，形塑社會的集體記憶與共同價值。文化韌性使我們能在不確定的世界中尋找安身立命的基礎，並在世代傳承中延續社會的穩定與創新。

我常以台北 101 大樓作為隱喻。這座建築能夠抵禦強風與地震，不在於外在結構的剛硬，而在於內部設置了阻尼系統，能夠有效消解衝擊。文化韌性亦如是：它讓社會能在劇烈變動中保持平衡，並在過程中孕育新的可能。

本次論壇，正是我們共同思索與實踐文化韌性的契機。我期盼藉由這個平台，能夠展開更多跨領域的對話，凝聚不同社群與專業的力量。讓文化資產不僅承載過去的歷史記憶，更成為推動社會永續發展的基石。願今日的討論，能化為未來的行動，使文化韌性成為我們社會持續前行的重要動能。

歷史城市中文化遺產的韌性思考與行動

／榮芳杰（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副教授）



這場論壇，對我而言，是第一次在一個正式且完整的場域中，將「文化」與「韌性」這兩個領域結合起來深入討論。過去幾年因為參與文資與ESG的相關工作，開始接觸到更多來自企業與非營利組織的永續議題。

其中，有一次特別的合作經驗讓我印象深刻——KPMG安侯建業社會企業服務團隊副總侯家楷是我們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MBA在職專班學生，兩年前他曾經告訴我，他們要啟動一項針對企業與非營利組織的永續普查，並主動邀請我協助將「文化資產的喪失」納入第一屆調查項目中。甚至在2024年7月KPMG團隊還協助文化部出版《文化ESG企業說帖及指引手冊》，供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從文化部的官網免費下載。

當時企業的問卷回覆中，「文化資產喪失」的關注度相對偏低，大概排名在第20或第21名，但在另一類組織——也就是我們所謂的「使命型組織」，例如非營利團體中，這個議題卻高居第三名。這樣的落差凸顯了目前產業界與非營利部門，在文化議題上的想像與認知存在不小的差距。

事實上，在永續的框架下，文化從來就不應是邊陲議題。只是我們過往較多討論能源、環境、治理等層面，相對較少提到文化。然而，文化不是不存在，它只是被低估了。永續的本質，強調的是「在不犧牲下一代的情況下，滿足當代的需求」。換句話說，文化資產的保存也不應只是封存，而應是活化與再詮釋。文化的延續要能貼近當代人的生活與需求，才能真正走得久、走得穩。

談到「韌性」(resilience)，我們一般會想到的是災害管理或恢復力——也就是在遭遇衝擊時，系統能夠多快、多有效地恢復到原本的狀態。但當我們把這個概念延伸到文化資產時，就會發現它其實需要更深層的理解。文化資產的韌性不只是保護物理空間，更關乎它在整個社群、社區文化系統中，如何在面對風險與變遷時，保有自身的核心價值。

目前國際間針對文化資產韌性的討論已越來越多，像UNESCO、聯合國減災署等組織，都強調從五個面向來理解文化資產的韌性：**抵禦、吸收、適應、恢復、轉**

型。這五個階段，不只是一種災後的回應流程，更是一種文化如何隨時間演進並持續對話的能力。

威尼斯是我經常提起的例子。這座水都每年都會因地層下陷與潮汐威脅而面臨海水倒灌的風險。城市街道上，那些刻在牆上的水位線，見證著一次次水災的歷史。對當地居民來說，水災不是偶發事件，而是一種生活常態——這正是一種「韌性的日常化」。而威尼斯人沒有逃避，而是學習與水共處，這樣的生活哲學，反而成為一種文化上的韌性資本。當然，威尼斯也曾試圖透過科技手段來對抗自然，例如著名的「摩西計畫」，企圖以78道可電動升降的防水閘門擋住海水。雖然該計畫最終因貪腐與工程複雜性而走走停停，但它也揭示了一個核心問題：韌性不等於控制自然，而是學會與自然共生。

在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國會大廈就位於藍色多瑙河畔。多瑙河偶爾也會氾濫，因為氣候異常甚至催生出一種「災難觀光」(disaster tourism) 的現象。這樣的例子提醒我們，當災害變成生活的一部分，所謂「轉型與進化」的過程其實是我們回應氣候變遷的自然反應。而我們需要的，是人類在面對氣候變遷威脅的狀態下經常要談的三個關鍵字：監測、適應與減緩。

早在我任職文建會期間，我們就曾在2010年舉辦台灣第一場關於「全球氣候變遷與文化資產保存」的國際研討會。當時英國的文化部就已提出「永續遺產(Sustainable Heritage)」的概念，並展開許多關於古蹟如何在氣候變遷中共存的研究。他們甚至設立了專門網站協助住在老建築中的人們理解該如何維護與適應。世界遺產委員會也曾進行大規模調查，了解各類有形文化資產面臨哪些氣候威脅，並據此提出具體風險對策。當時，我們也在台灣試著將這些經驗在地化。2011年開始，我們邀請成功大學建築系團隊，建立了台灣本島與離島的文化資產氣候風險地圖，作為文資管理預警與規劃的依據。

今天，談「文化資產的韌性」，我想強調的是：社區很重要。每一個文化資產都承載著在地的歷史、意義與情感，它的保存與否，不能單靠制度與法規，還需要深度的在地參與與共識。只有真正理解文化資產在地方社會的角色，我們才能在未來的災害、衝擊中，穩住我們共同的記憶與價值。

讓文化資產與永續社會對話，不只是回顧歷史，更是尋找未來的起點。

北埔聚落的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姚其中（臺北市古風史蹟協會創會會員）

今天，很榮幸能在清華大學這個場域，和大家分享我近年來在北埔聚落參與文化資產保存的一些觀察與心得。文化資產保存，不僅是建築的保留，更是歷史與情感的延續。我想從「點、線、面」的角度來談保存的方式，並以北埔為例，說說這個罕見聚落背後所蘊含的價值。



從點的保存開始說起。在我們熟悉的新竹縣，就有許多獨具意義的文化資產。像關西的太和宮、羅家祠堂、羅屋書院，都是信仰與家族記憶的重要據點。今天也很開心在現場遇到羅屋書院的羅仕龍老師，多年來他出錢出力，守護這座老屋，讓它成為文化傳承的平台。在竹東，也有一棟特別的傳統建築——甘屋渤海棠，是一座兩層樓的三合院，相當少見；而廖家的武威世第與姜阿新家族的洋樓，則交織出當地繁榮的歷史脈絡。長春醫院則在多方努力下轉型為人文咖啡館，是文化再利用的絕佳案例。

延伸到線的保存，我們會想到老街的整體樣貌。像上坪老街、湖口老街，每一棟街屋都是曾經的生活痕跡。然而，許多老街保存困難，往往因產權無法整合導致修繕無門。然而金門國家公園完整地保存了六大聚落，不只是單棟建築，而是整體空間，包括祠堂、民居、廟宇、洋樓，構築出一個活生生的歷史場域；在巴黎的老佛爺百貨公司開放頂樓，供在地居民或是觀光客免費搭乘電梯到頂樓的平台眺望整個巴黎市區，可見到一個點一個點匯成一個面，整個巴黎就是一個古蹟保存區。我們用觀光產業收入的觀念來看，古蹟保存是一個點線面的保存方式。

北埔，就是這樣一個具備「面」保存潛力的聚落。它不僅是清代中期漢人武裝移墾的見證，更是一個高度整合的歷史空間。在我的老師梁宇元的手繪圖中，可以清楚看到北埔的空間架構：外有竹籬，內有四座城門，中心是慈天宮，圍繞的是民宅與各類建築，由此可知北埔聚落可謂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北埔聚落的文化資產可分為六大類型：公館、民居、廟宇、宗祠、陵墓與老街。金廣福公館見證了客家與閩南人攜手移墾的歷史；姜家天水堂、曾屋忠恕堂、姜阿新洋樓則展現了民居從傳統到現代的演變；慈天宮融合觀音與媽祖的信仰，是

地方精神的中心；姜氏家廟由老姜與新姜家族合力建成，可謂全台最美、裝飾性最強的宗祠之一；開基義友塚則為那些為開發北埔犧牲的「大墓公」留下歷史見證；北埔老街至今仍保有旺盛的商機與人氣，週末彷彿一場嘉年華。來訪者不只是觀光，也是在親身感受一段段歷史的片段。

而我們能夠見到這些保存成果，離不開在地耆老與文史工作者長期的投入與守護。像是姜家祠堂原本殘破不堪，在多方努力與客家委員會的支持下，重新煥發新生，我們也看到當地保存的石雕、木雕、彩繪，融合了在地與廣東匠師的技藝，成為文化資產中不可或缺的美學證明。

回到文化資產保存的意義，我們講「國者，人之積」，國家的歷史，是由一個個地方組成，而地方的歷史，又是由一個個家族串聯而成。北埔由姜家為首的家族所奠基，建構出新竹縣發展史的架構，新竹縣發展史同樣建構了北臺灣發展史的架構。無論是老姜的天水堂，還是新姜的雙堂屋，每一塊磚瓦都承載了時代的重量。我們之所以要保存，不只是為了紀念過去，更是為了讓後人看見，台灣在四百年的開發歷程中，那些曾經閃耀的建築與生命故事。

我希望透過這樣的分享，讓更多人理解：古蹟不是冰冷的建築，而是我們共同的資產，是一代代人共同記憶的載體。也願這份記憶，能在你我的參與中，持續延續下去。

公眾參與—— 當我們站在文化資產制度高牆前

／林秀叡（藍盾永續文化有限公司負責人）

很感謝清大韌性中心主辦這場論壇，這可能是全台第一個由學院主辦、以文化資產韌性為核心議題的正式論壇。國際文化遺產界已討論文化韌性多年，這裡特別提一下近年的歐盟「REACH 專案」，主張融合社群參與、知識共構、地方性與開放性，才能轉化結構性不平等，避免文化排除。



我出生於嘉義，在新竹市成長，高中畢業就到外地，中年才返鄉創業。背景是建築與文化資產，曾任職在學術單位、政府機關與民間事務所，目前與朋友開設公司從事文資實務工作。因為在不同體制、角色之間遊走，有機會從不同面向思考制度。

我最初受到樂生保存運動的啟發，後來陸續參與一些文化資產保存搶救行動。在國外念書時，參訪各國世界遺產與歷史現場，深受感動。2015年曾以獨立記者身分進入 UNESCO 世界遺產大會會場，當我看見文資保存議題在國際殿堂上針鋒相對、言詞激烈，卻可以保持程序清楚、公開透明，讓人不禁思考：台灣現行制度如何擁有這樣的公共詰辯機制？

回看台灣，太多歷史建物還來不及被認識，就因土地開發壓力而消失。民間搶救聲音很微弱，但資訊與資源都不對等。許多搶救人士不斷思考：公眾意見如何真正進入到文化資產審議制度中？我們可說，一個社會如何處理文化資產爭議，並開放公眾參與，會是衡量文化韌性的重要指標！

今天不是專門來批評所有公部門或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每個人都有結構中的角色限制與潛力。我們共同活在一個過勞之島，越多人願意關注文資程序正義，就有可能推動制度變得更好，畢竟沒有程序正義，就沒有實質正義。

回顧台灣《文化資產保存法》在1982年施行，背景是鄉土文化保存運動興起，以及社會動員搶救林安泰古厝。整部法可謂「命帶搶救」性格，來自對失落的焦慮，也注定充滿掙扎與折衝。

而「文化資產」本身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也是一連串歷程。可視為社會記憶與遺忘的競逐歷程，由有權力者選擇要記住什麼、要排除什麼。也可視為是文化資產公共意義的辯證歷程，以及如何在搶救中培力與復原的歷程。即使少數個案獲取文化資產身分，也會面臨文資空間轉化與再定義的永續發展歷程。因此，如果能建構更開放的公眾參與，除了可避免狹隘的象牙塔專業獨斷，也可促進文化資產擁抱多元價值、連結現實、持續反思。

在說明公眾參與困境之前，先談談結構性困境。首要是文化資產預算極度匱乏。整體文化預算僅約佔總預算1%，而文化資產預算不到其中1/10，企業界也鮮少投入資源，導致文化資產機關人力與資源極為有限。即使過去鄭麗君部長任內喊出「部部都是文化部，沒有人是局外人」，文化預算曾達到高峰（僅佔1%），也舉辦了十二場全國文資會議彙整各界建議；但2024年文化資產修法座談僅剩4場，且完全未提及公眾參與制度的改革，制度改革「不進則退」。

其次是上位空間計畫未整合歷史文化脈絡，導致文資法淪為最後一道防線。人民往往被迫進入「搶救式」提報狀態，疲於奔命，也難以與開發方抗衡。

在上述資源不足、開發壓力輾壓的現況下，部分機關與文資審議委員容易做出更保守、消極的決定，而保存方就被迫批判機關或質疑文資專業者，形成文資領域「弱弱相殘」困局，各方皆承擔了過度身心壓力。

接著談談公民參與，可參考美國學者Arnstein的「公民參與階梯」模型。從最低層「被操弄」到最頂端的「公民自主」，參與分為八個層級，可用以檢視政府是否真正賦權給人民。台灣文資制度中的公民參與，目前停留在中間偏低的層級。大多數縣市的文資審議仍採閉門討論，專業決策過程不透明，會議記錄匿名，文資委員有權無責。甚至，少數專業者將公民參與視為「亂象」，將結構性的制度問題，簡單歸咎於並無行政權力與資源的民間人士。

再談談現行文資制度爭議。2016年修法以來，2017年已有民間團體訴諸改革，當年訴求為「一、文資審查與審議過程應納入多元領域與公民代表」、「二、文資程序應全面全程開放透明，接受監督」、「三、充分公開文件資訊」與「四、盡速規劃下一次母法修訂時程」。至今，未有明顯改變。

有關公眾提報權的爭議，最早在2000年的文資法已經賦予公眾具有古蹟申請權，但常遭政府忽視；2005年修法則限縮為提報權，僅視為建議權，大幅削減公民參與的法律效力。

提報之後，會進入現勘與審查程序，現況常見地方政府出現程序瑕疵，甚至在現場有不當行政裁量，阻礙提報人參與。

如果個案幸運地進入文資審議階段，問題也層出不窮。如文資委員由地方政府

遴選，機關代表可達1/4席次，曾經出現機關代表全數出席投票以主導結果的狀況。也常見部分文資委員對程序與專業認知不足，出現不當投票。

現行文資審議過程長期迴避了公開討論，持續採取閉門投票，匿名紀錄，導致個別文資委員難以自證具有專業判斷的獨立性。現場申請人、提報人與旁聽人沒有交叉對話機制，也無法從簡略的會議紀錄來了解專業意見與決策理據，整個文資審議過程堪稱沒有社會溝通效果。

如果個案獲得了文資身分，後續行政程序繁雜，也往往因為專業壁壘高築、經營資本限制等因素，導致公眾參與的機會少之又少。

即使現行制度長期忽略了公共性，易遭到有權力者操作，但仍有突破機會。例如苑裡老市場在等待修復工程的過程中，搭設景觀平台，開放資訊與公眾對話，便是在現行制度下的創意展現。

以上呈現了台灣現行文資制度與實務中，公眾參與的系統性困境。當公眾站在制度與權力高牆前，仍不放棄提報與守護，是一種困難卻堅定的實踐。我們不應再讓文化資產制度成為「弱弱相殘」的戰場，而應看見結構中的權力不對等，有權力者應設計制度來制衡自身，並持續打造一個增進理解彼此、思辨與實踐的公眾參與制度。

姜阿新教育基金會與姜阿新洋樓經營分享

／黃雍熙（姜阿新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大家好，我很榮幸與各位分享我們家族與姜阿新洋樓的故事。

這棟洋樓，是岳祖父姜阿新先生在事業巔峰時期建造的。1965年，姜先生的公司不幸破產，所有資產都用來償還債務，洋樓也因貸款遭銀行扣押失去產權。我們全家遷往北部，這棟建築則閒置近三十年，屋況每況愈下。



期間，新光集團的吳東昇先生發現這棟房子，感到可惜，便向銀行承租、略作修繕，避免其繼續惡化，維護基本結構。2012年我們無意間得知銀行將拍賣此樓，於是下定決心要將它買回，作為對祖父的紀念。很幸運地，我們成功標回。

然而，回來後才發現整個園區有三棟建築都是傾圮不堪，修繕難度遠超我們想像。但既然買回來，就得一肩扛起。於是從2013年起，我們啟動修護工程，歷時六年才逐步恢復昔日風貌。

在修復過程中，我們深深感謝客委會與縣府文化局的支援，也四處尋找仍掌握傳統技藝的師傅，重現已逐漸失傳的工法。我們曾辦理「古蹟日」，開放洋樓讓民眾觀摩修復歷程與細節。2018年年底，洋樓終於修復完成，然而我們也首次意識到古蹟經營與維護的複雜性。

隨著深入了解，我們驚訝發現：這座洋樓正是北埔百年聚落建築演化的最末一塊拼圖。從金廣福、慈天宮、老姜的天水堂、新姜的四合院，最終走到這座融合西式風格的洋樓，其建築風格見證了北埔拓墾歷史軌跡。

修復建築只是第一步，真正重要的是延續精神。我岳父廖運潘先生，身為姜阿新的女婿，一生陪伴其左右。他堅持我們應該珍惜這份得來不易的緣分，也不要忘記姜先生一生關心教育、重視地方發展的理想。因此我們成立了「姜阿新教育基金會」，秉持他留給子孫的話：「讀有益書，行仁義事」，作為基金會的宗旨。

基金會成立後，我們舉辦了感恩音樂會、並邀請在地學校師生、社區居民參與導覽活動，回顧北埔記憶。廖運潘先生書寫的《想到什麼就寫什麼》九本套書也由公視改編為《茶金》十二集的影集，將我們家族歷史與台灣茶產業的興衰搬上螢幕

，讓更多人認識這段茶業文化記憶，我們另將此套書與《茶金》影集相關的部分摘錄成《茶金歲月》單行本，供觀眾閱讀其中之真實故事。

我們也致力於將洋樓變成一個結合生活美學與環保理念的空間。無論是接待來客用的瓷杯與漆器、堅持每日清洗茶具與擦手毛巾，避免使用一次性用品，或是在各個空間擺設鮮花，都是我們希望呈現優雅與環保理念給訪客體驗的方式。文化的美，不該只是靜態的展示，而應該是日常中的實踐。

此外，我們積極舉辦活動，從音樂會、茶會到中秋月光音樂節與食平安宴，讓古蹟空間不只是建築遺產，更成為社區的文化平台。我們也期待傳統八音文化可持續傳承，在國小成立八音班培養小朋友學習，讓九十歲的老師傅與九歲孩童一同學習、演出，讓文化在代際之間延續下去。

目前，我們已經舉辦超過350場活動，並提供獎助金支持在地學校孩童，協助弱勢族群的發展。我們也銷售自製茶品與書籍，以維持基金會的永續運作。此外，秉持大家共好的意願，協助原住民部落推動母語復振，將這份文化共享的精神擴及他人。這些努力也獲得文化部肯定，2023年獲頒「古蹟維護優良獎」與2025獲選「百大文化基地」的殊榮。

最後，我們相信：古蹟不只是一棟老房子，更是家庭的韌性、聚落文化與社區的延續、整個社會的象徵。透過這段旅程，我們學會珍惜，也願與大家分享這份幸福與文化。謝謝大家。

歷史建築活化與北埔經驗案例

龍瑛宗文學館成立與運作

／劉抒芳（龍瑛宗文學藝術教育基金會董事）

我是劉抒芳，龍瑛宗文學藝術教育基金會的董事之一，同時也是龍瑛宗的孫女。每當我在文學館擔任導覽員時，總會有人好奇地問：「妳為什麼姓劉？」其實，龍瑛宗是我祖父的筆名，他本名姓劉。這個有趣的小插曲，常常成為揭開導覽的第一個序幕。今天我想分享的不只是龍瑛宗的文學，也包括他與這棟歷史建築——過去北埔公學校老師宿舍、如今的龍瑛宗文學館——之間深刻的連結，以及這座館舍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



龍瑛宗文學館這棟建築位於北埔國小後門，是1916年日治時期興建的日式雙拼木造宿舍。過去曾擠住兩戶老師家庭，空間雖小，卻承載了豐富的人情記憶。多年荒廢後，鄉親們記得這裡草木叢生，牆高如迷宮，甚至有孩子說像「鬼屋」；但也有人清楚記得哪位老師曾住在這裡，那是一段屬於北埔人的共同回憶。

2017年，這棟建築被登錄為歷史建築。在文化局、客委會與基金會前董事長（我父親）的多方努力下，我們開始了修復與再利用計畫。2020年8月，龍瑛宗文學館正式落成，成為北埔鄉內紀念在地作家的文化空間。

龍瑛宗的自傳小說《夜流》中曾提及，他小時候常到老師宿舍找日籍老師，對書本與知識充滿好奇。正是在這位成松老師的啟發下，他走上文學之路。今天，能將他的文學生命回歸到這個啟蒙地點，是一種充滿意義的循環。

館內的修復設計，也努力將建築的歷史價值與龍瑛宗的文學精神融合。除了保存原始建築的風貌，我們也透過展覽與活動，使這裡成為文學與生活對話的場域。

龍瑛宗文學館現由基金會負責營運，目前每週開館四天（週四至週日，上午10:00-下午5:00），並規劃了一系列常態與季節性活動，包括春季的文學地景小旅行、夏季的週年館慶暨冥誕紀念系列活動、秋季的文學講座與夜間開館等。還有一些其他企劃，例如與客委會、公部門之大企劃裡配合的一些小企劃；與文化局文資科、教育局的一些計畫，另外我們也與北埔國小合作「小小導覽員」活動，將他們

的校本課程拉到文學館裡面來上，使文學館成為一個在地文化的教學場域發展，也與清華大學、北埔鄉公所合作舉辦講座與展覽。孩子們在文學館中學習、創作，讓這裡成為在地文化教育的場域。

過去營運初期的幾個月裡，全靠我與弟弟妹妹輪流顧館導覽，現在已有約二十位熱心志工加入導覽行列，年紀從學生到八十多歲的長輩不等。有位八十多歲的志工大哥甚至特地學會簡報製作並以紙本輸出，用客語帶領文學地景小旅行，是我們最敬佩的終身學習典範。

雖然我們仍面臨人力不足、地理位置偏離老街人潮、以及文學艱澀不易親近等挑戰，但我們不斷嘗試透過文學結合遊戲、實境解謎、製作客語繪本等方式，希望讓更多人願意走進文學，同時透過走進老街、發送傳單、館際合作等行動，期待擴大龍瑛宗文學館的知名度。

今年（114年），我們預計舉辦15場活動、目標吸引一千人次參與，並持續推動公益導覽與教育回饋。例如與南埔社區合作的生命繪本展覽，就是希望更多北埔鄉親願意走進文學館，看到熟悉的故事，也找到自己的回憶。

龍瑛宗文學館，不只紀念一位作家，更希望成為一個活的文化空間、一扇打開北埔人文風景的窗。歡迎您來走一趟，聽一段故事，看見一份深情。

下山水尾鄭氏家廟修繕歷程分享： 回歸初心的旅程

／鄭香辰（私立承山幼兒園執行長）



修繕家廟的過程，讓我重新認識了「韌性」的意涵。

芎林鄭氏家廟因屋瓦漏水、結構老舊，加上土地權屬複雜，長期無人整修。父親生前曾多次提及其破損情況，直至他過世，相關問題依然懸而未決。部分土地已流轉至非宗親名下，修與不修的討論，逐漸牽動更深的分歧與利益爭議。

修繕初期，我們成立宗族社團法人，召集散居各地的宗親，進行多場會議，從基本意見整合到經費與工法討論，一步步建立共識。多數人對於傳統建築缺乏了解，甚至堂兄弟已不熟識彼此面貌。在這樣的起點上進行討論，難度可想而知。但我們選擇從聚人開始，而非先談經費與硬體。唯有人回來了，家廟才不再是單純的空間載體，而能重新成為記憶與關係的容器。

我們從零開始，實地調查、測繪、請教專業匠師。過程中才發現，鄭氏家廟構造因地勢差異，高度達六米二，遠高於一般傳統形式，我們邀請傅明光老師等具傳統建築修復經驗的專家協助判讀結構，針對損壞樑柱進行檢測與評估安全性。選材方面，我也親赴南部林場挑選二代林檜木，參與製材與原木裁圓定心等工序。為避免使用防腐劑，與製材廠、大木作匠師、建築師等眾人意見經驗反覆溝通，選用天然油脂含量足的木料，外表漆天然護木漆，以確保結構耐久與安全。屋瓦則借用行天宮之前的傳統模具重新燒製，保留傳統比例與尺度與耐用度。

在修繕過程中，我們將舊材全面回收，提供湖口社區規劃師再利用，落實材料循環使用，整體工程幾乎未產生營建廢棄物。從規劃階段即嚴格計算用料，配合傳統工法，讓修復過程幾乎達到零浪費的目標。

我過去曾任職公部門，處理建築與都市計畫相關業務，對制度與現場落差深有體會。後轉入教育現場，才更明確體認到，唯有透過教育，才有可能從根本轉變人們對環境與建築的態度。因此，當我投入家廟修繕，也同步思考：這樣的經驗，是否有可能轉化為對下一代的影響及文化傳承？

我在參與承山幼兒園的創辦與興建過程中，嘗試導入自然建築觀念，邀請師生與家長共同參與夯土牆與雨水積磚等工作坊，實作過程中幾乎零機具、零棄料，孩子們從中學會材料的特性，也體會建築與環境之間的關係。這段經驗使我堅信，若能將永續建築的觀念透過實作帶入教育，將能在孩子心中種下關於土地、文化與資源循環的基本理解。

因此在家廟修繕時，我也重新串連這些跨領域的合作網絡。泥作師傅、製材廠商、原木供應商等多是早年參與教育場域時建立的夥伴關係。我也試圖將工藝、材料與文化理解整合起來，這座家廟的修復，歷經多次討論與調整，在預算極為有限、結構繁複、人力不足的條件下，仍逐步完成。這過程並不輕鬆，但它所展現出的，正是一種面對現實條件下仍能穩步前行的韌性：持續整合資源、回應環境變化、並堅持一個關於文化與土地的初衷。

現在，鄭氏家廟的修復初步到達一個段落，我們也將持續努力、展現韌性，以應對後續的挑戰，若這段經驗能推動更多在地建築、教育與文化保存之間的對話與合作，那麼它所累積的韌性，將有機會在更多場域持續發生。

新姜在北埔的發展記憶與紀錄

—新姜後代的回憶

／姜逸浩（新姜天水堂）

我是北埔新姜家族的一份子，從小就住在新姜天水堂。今天很榮幸能和大家分享我家族的故事，也談談我們如何守護這座有百年歷史的老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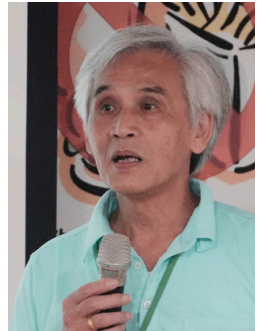
新姜這個名字，對很多人來說也許不如老姜家族響亮，但其實兩者密不可分。老姜家族在北埔開墾，是由姜秀巒帶領，直至1895年姜紹祖抗日時過世。那時老姜後代年紀尚小，我的曾祖父姜滿堂就開始協助處理後續事務。北埔事件雖多以老姜為主角，但實際上許多幕後事宜都是我曾祖父一手協助完成。

1895年，曾祖父創辦「榮和號」，逐步發展成為北埔最大型的商號，販售各式商品，甚至進軍茶葉、鴉片公賣、樟腦貿易等領域，成為當地舉足輕重的商人。此後我們新姜家族也逐步在政界、軍界、教育界、醫界發展出不少人才，因此大家常說「新姜比老姜辣」，這句話的確不是空穴來風。

曾祖父的發跡故事也充滿傳奇色彩。家中流傳著「五鬼運財」的故事——據說他年輕時在北埔遇見一位算命先生，誠懇待之，揹他過田梗、為其洗腳並留宿。算命先生被其誠意感動，指點他風水穴位，又交代他要燒垃圾驅仙，這樣子孫才能興旺。結果真有三名分別為紅面、黑面與黃面的小孩在南埔出生，據說正是五路財神之象徵，也為曾祖父的創業路帶來好運。

還有一段「河南兵與扁擔」的故事，也是我家老宅一直供奉布施爺的由來。雖然坊間有人說那是神話或迷信，但那幾根扁擔至今仍供奉於宅中，我們也仍然遵循祖輩的習俗守護著這份記憶。

在新姜天水堂這座宅第裡，曾祖父種下鳳凰木、茶樹與椰子樹，據說也是風水師的建議，象徵子孫繁盛與家運昌隆。後來，我們也種了櫻花，這是日治時期留下的習慣。我的童年就是在這些樹下長大，打赤腳、拿竹竿摘櫻桃、棗子與楊桃。鄉下小孩雖然物資簡單，但生活自在、健康快樂，這些回憶至今仍歷歷在目。除了玩耍，我們也種了許多果樹與花草，像是梅子，每年結果後就拿來釀梅酒、做脆梅或



或泡梅子汁。這些是鄉下人家最自然也最實在的日常。也擔任新竹育賢國中的校長。我九位姑姑中也有人擔任關西國中校長。這樣的家族背景，也正說明瞭新姜家族在教育領域的深耕與貢獻。

然而過去的幾十年間，新姜家族在北埔的歷史被淡忘了。我常想：老姜、金廣福、姜阿新洋樓都有人介紹，難道新姜就不值得被記得嗎？北埔的歷史是多元的，老社區、各家家族構成今日的文化底蘊，我們不應該遺漏任何一環。

因此，我決定把我們的老宅推向社會，不再只是家族私產，而是讓大家認識它、親近它。這棟百年老屋本身就是北埔珍貴的文化資產，而文化的傳承比什麼都重要。沒有文化，一個地方就沒有特色。小吃是地方化，大房子更是歷史與文化的見證。

新姜天水堂，是我曾祖父與祖母參考故鄉四合院風格，並依風水建造的。我從出生就在這裡生活至今，除了唸書與當兵，我從未離開。這裡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我都熟悉。現在70歲的我，仍住在這裡，繼續守護這個家園。我太太也從嫁進來後就與我一同照顧母親與老宅。2023年，我正式提出文化資產保存申請。我們兩位七旬長者親力親為，一點一滴地維護宅邸，整理家務與祖先祭祀，從未懈怠。

■ 清華大學韌性研究中心林慧音研究員補充說明：

去年12月姜大哥、Reiko姐跟福仁老師談到，北埔的歷史不能少了新姜，也促成今日的論壇。後來，由於山崎禮子（Reiko）老師因病接受治療，他們更堅定要將家族的使命與記憶傳承下去。

今年5月起，我們發起新姜天水堂志工行動，號召社會大眾一起來除草與維護。原本只預期七位志工，結果每次都有十多人主動參與，讓我們感受到社會溫暖的力量。Reiko老師即便在化療中，仍透過臉書與志工們聯繫，分享心情與感受，傳遞她心中那份溫柔與堅毅。

新姜天水堂的故事，不該被遺忘。我們希望它能繼續存在、被看見，被珍惜。歡迎大家來北埔，除了金廣福、姜阿新洋樓與老姜天水堂，也請來看看新姜天水堂，這是北埔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謝謝大家。

如何對原來古蹟所有權人進行補救措施 和保障所有權人的開發權益？

／符宏仁（符宏仁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多年來，我曾走入無數歷史空間：有的已成國定古蹟，有的仍風雨飄搖，有的則即將拆除。身為建築師，我始終認為，修復工程所面對的，不只是建築本身，而是時代的記憶、個人的情感、制度的滯後與社會現實的折衝。



我最初參與文化資產修復，是在板橋林家花園。當時文化資產保存法尚未制定，修復實務多仰賴經驗與責任感。直至民國 71 年，文資法頒布，修復方才制度化，初期僅區分第一至第三級古蹟，尚未納入「歷史建築」的分類。

文化資產相關法規的演進，步伐並不迅速。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於民國 87 年才首度訂立，歷史建築與紀念建築則至 112 年始被納入移轉範圍。這反映出制度終於意識到，文化資產不僅屬於國家，也關係到私人所有權人的財產權益，其補償與保障也應制度化。這是遲來的「韌性」展現制度在社會價值與私產保障之間逐步調整。

一旦建物被指定為古蹟或歷建，所有權人即面臨諸多限制，不僅不得隨意拆改，連土地開發權亦受限。若無相應補償，極易引發爭議與訴訟。如新竹北埔姜家古厝一案，歷經三次行政訴訟，法院認為政府限制過多、補償不足，導致機關敗訴，凸顯制度補償機制與財產權保障間的落差。

容積移轉作為補償手段，原理為將古蹟之開發容積轉移至他地，以取得經濟補償。雖制度設計良好，實務上卻困難重重，最常見者即為缺乏接收基地。少數成功案例如景美集應廟得以部分轉移，但也有如新竹鄭進士第等個案，自指定至修建歷時四十年，過程艱辛。

此外，所有權人除失去開發自由，尚須負擔維護責任。即便政府提供補助，仍須自籌 5% 至 10%，對多數家庭而言負擔沉重。無人居住者更需委託管理，一年維護費往往高達數十萬元，補助金額難以涵蓋所需。少數如龍瑛宗文學館仰賴基金得以維持，但多數案例皆財務拮据。

文化資產保存也涉及公共參與。現行制度僅授予所有權人申請指定之權，其餘僅可提報。一經提報，建物即可能列入暫定古蹟，啟動限制程序。對聚落內非提報住戶而言，此舉常造成生活與財產上的突如其來之壓力。也有人意圖放任建物傾頹以求解除指定，惟依現行法規，只要資產價值仍在，撤銷幾無可能。

作為第一線實務者，我深切感受到制度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我們並非無意修復，而是制度未提供合理且可行之途徑。目前的公共參與多僅發生於修復階段的說明會或公聽會，時機已嫌過晚。若能於指定前即邀集地方居民與所有權人參與，諸多矛盾或可及早化解。

文化資產承載歷史與地方記憶，理應獲得妥善保護。但保護需付出成本，也需制度與資源共同承擔。若缺乏完善法制與財政支撐，保存恐淪為空談，甚至成為負擔。因此，文化資產保存應超越法律規範，轉向「韌性治理」的實踐在強調保護的同時兼顧人性，在重視歷史價值的同時理解生活現實。唯有制度與現實接軌，文化資產保存方能成為全民共享的永續成果。

政府部門協助民間保存文化資產 和「公共財」的可能創新方案與政策

／楊長鎮（客家委員會前主委）



長期以來，我們的文資制度建立在一個不切實際的前提上：要求私有產權人，為了公共利益，自行負擔文化資產的保存成本。這其實既違憲，也不公平。如果文化資產經過法律定義，確立其為國家公共利益，那麼作為公共事務的一環，理應由國家和整體社會共同承擔。產權人固然應對其產權範圍內的管理負責，但超出個人利益、屬於社會共享的文化價值部分，應當是國家責任。

這幾年，我們好不容易推動出「容積移轉」制度，的確是個進步。但試想，若古蹟位在非都市計畫區、甚至偏鄉地區，沒有容積可轉移，那是否就等於它們不值得保存了？文化資產無論位在何處，都可能具備國家層級的價值，保存機制不該因行政區域而有落差。

我年輕時參與苗栗公館鄉五穀宮的保存行動，記得說明會上一半白髮、一半黑髮，老一輩希望拆除，年輕人則想保留。當我站起來說：「我們想保存的是你們這一代的成果。」結果反被罵。不到幾週，凌晨四點，怪手就開進來拆除。當地攝影師事後販售被拆前的照片，許多人搶著買回記憶。這正說明我們的制度有問題。

文化資產不該被視為負擔，而是資本，是社會共同擁有的文化資本。就像經濟上講的「第一桶金」，文化資本是延續文化再生產的基礎。如果我們始終將保存視為「損失」、視為「問題」，那麼它永遠只會被看成阻礙發展的障礙物。

2008年，我負責撰寫客家政見時，就有一個構想：將台三線打造成國家級的客家文化保存區。這條昔日被稱作「內山公路」的偏鄉小路，卻蘊含無窮文化寶藏：北有鍾肇政、鄧雨賢、杜潘芳格、吳濁流，南有蕭如松、龍瑛宗、鄧南光、李喬、詹冰……如此豐富的文化脈絡，值得我們一館一館地保留，構築文化地帶的靈魂。有人會批評這樣又蓋了蚊子館。但問題不在建館，而在制度配套的缺失。如果制度健全，即便換了政府、換了主委、換了縣長，這些文化設施仍然能永續運作。所以我主張，不僅是容積，而是應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文資發展權銀行」，明確劃

分「所有權」與「發展權」。所有權屬於私人，但發展權應屬於社會。當土地因文化保護而被限制使用時，其損失應由全體人民共同補償。簡單說，若一塊地被劃為高密度商業區，要開發到其最大容積，應從發展權銀行購買超出基本開發權的部分。這樣才能公平分攤文化保存的社會成本。

舉北埔為例，這個小鄉鎮擁有姜阿新洋樓、天水堂、姜氏家廟、大隘公館、龍瑛宗文學館、鄧南光紀念館等文化資產，密度極高。不遠的南埔還是蕭如松的出生地。這些都是台灣第一代的現代人，在小小山城中出現如此高密度的精英。他們的貢獻，不應只靠一兩代私人基金會支撐。這些文化資產需要制度性的保存與經營。我也面臨相同難題。我的家族正考慮將父親所蓋的老屋提報為歷史建築。問題是：我兒子住內湖，下一代還會守著這棟房子嗎？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若不先取得文化資產的法律地位，它日後就沒有被保存的機會。

我們應該將文化資產納入整體國土規劃，讓每一份土地都分攤公共文化的義務。不是靠容積獎勵無限膨脹，而是制度性地將文化保存視為國家基礎建設的一部分。這樣的機制才能讓文化資產成為國家文化資本的積累，而非個別人的負擔。文化資產的保存不能只靠硬體修繕，更需經營。經營才是文化活下去的關鍵。我們應該發展類似生態博物館的概念，把整個地區、街廓、記憶紋理納入文化資產的範疇。苗栗的「紅車路」就是例子，那條通往義民廟的街道，其空間脈絡本身就具文化價值，都市計畫不該輕易更動。

都市計畫、區域計畫與國土計畫，從源頭就應整合文化資產保護的思維。我們不能每次都等到老屋要拆才緊急搶救。該由政府於規劃初期，就完成分工、分攤與保留機制。

最後，我想談談文化價值的判準。有些文資委員仍停留在「古老」、「名師」、「工法精緻」的舊有思維，忽略了文化真正的意義——它是我們與先民的對話，是我們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許多生活中的場景與空間，雖不具絕對古老或名人色彩，但卻承載著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與記憶。

我們保存的每一棟老屋、每一條街道、每一段地景，都是國家文化資本的一部分。每增加一份文化資本，國家的內涵就更豐富，文化的生產力也隨之增加。我們的GDP與就業率固然重要，但文化生活的厚度與延續性，才是國家真正的靈魂。

希望未來的制度能朝向這樣的方向邁進，不再讓文化資產的保存淪為個人英雄式的犧牲，而是全民共同承擔的文化事業。



■ 2025社會韌性論壇

辦理時間：114年6月11日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韌性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服務科學研究所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 論壇手冊

發行：國立清華大學韌性研究中心

總編輯：林福仁

文字編輯：郭瑞坤、鄧立婷、宋虹儀

美術編輯：鄧立婷

